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歌曲对民族主义的建构

——以歌词为中心的考察

徐 曼 珊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音乐是一定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的产物,能准确把握和及时反映时代的主旋律,能动地反作用于时代的政治。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复兴起以“富强”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受到思想解放激励的音乐界也正当蓬勃发展之时。彼时,音乐工作者们精心编写歌词,树立民族认同,抒发民族情感,彰显民族精神,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情与民族主义情结,为转型期的中国提供了新的合法性来源。

[关键词] 改革开放;歌曲;民族;民族主义;认同

[中图分类号]J6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 - 5595(2009)06 - 0056 - (05)

音乐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现象,与其存在的时代、文化背景、政治现实密切相关。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从封闭转向开放,随着改革的进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逐渐多元化,出现不同阶层的分化,过去强调“政治挂帅”、“阶级斗争”的艺术表现已不适应新形势下日益多样化的精神需求,相应地,僵化的国家意识形态也难以满足对广大社会各阶层进行整合的需要。因此,中国的政治领导人转向民族主义,以便从中获得新的凝聚力和合法性资源。此阶段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是以“富强”为目的并与现代化相伴随。此外,在“文革”十年的思想垄断和政治高压骤然解禁之后,中国大地真正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蓬勃景象。其中,音乐也受到活跃的思想的影响,蓬勃发展,反映甚至形塑着新兴的民族主义。政府在有意识地引导使民族主义最大限度地为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方面,也充分利用了音乐的特性。在此特殊的历史时期中,二者可谓相互激荡、相互影响。故本文拟以歌曲的歌词为载体,以民族主义为方向,探讨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重构中国“共同体”①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学艺术百花齐放,反思“文革”,中国的精英们面临着如何评价这段历史、如何认知国家以及如何引导人民重构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的问题。对于共同体的建构有很多途径,如国民教育、颁布法律等。其中,歌曲因其形象生动、受众广泛的特点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一)回归历史重新确立集体想象

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灿烂,对历史的自豪是将全民族连结起来的纽带,中国人民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共享的尊严。十年“文革”带来对社会秩序和思想观念的双重冲击,“破”字当头,“立”却没有跟进。因此,在全面调整和改革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为了摆脱这种失范的状态,为了给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精神支持,就“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1]。而重新解读、发现和建构历史,有助于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激发对祖国的热爱,培养积极的民族主义情结和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通过展现共同的经历,强化集体记忆,使民族国家的每个成员更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重新唤起一种“我们属于同一个共同体——中华民族”的想象。

歌曲创作亦用此法。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以高分获“优秀新作品奖”的《我热恋的故乡》,欲扬先抑地勾勒了一幅“并不美”的故乡图画:“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干涸的小河”、“贫瘠的土地”,但这是当代人与祖先的共同经历,都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作,收获微薄的希望。“住了一

[收稿日期] 2009-02-23

[作者简介] 徐曼珊(1986 -),女,辽宁大连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年又一年,生活了一辈又一辈”,与祖先的想象的关联使得当代人依然对这片土地“亲不够”,因而在结尾以热情、执着的呐喊表达了改造故乡的决心和信心。1985 年“当代青年喜爱的歌”评选中获三等奖的《那就是我》,旋律仿佛吟诵,道出游子对故乡的思恋。以故乡的“小河”、“水磨”、“炊烟”、“牛车”、“渔火”、“沙滩的海螺”、“青山的倒影”等为关怀对象,利用一系列象征固化了人们对于故乡的朴素情感,完成了对于共同体的想象。这类歌曲还包括如入围 1985 年“当代青年喜爱的歌”评选的《多情的土地》,勾画出所有人心中共同的妈妈般的“土地”形象,这个封闭的地理空间同时还是具有血脉意义的族群空间,给人以深沉的历史感。

由于关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是历史地继承、延续的,把过去和现在相连,才更利于民族心理认同在代际之间的传承。第二届“当代青年喜爱的歌”获奖歌曲《我们是黄河泰山》(1986)以豪迈的气魄追溯过去,将“祖先的历史”比做“黄河万古奔流”,将“中华的风骨”比做“泰山千秋耸立”,尽管过去有过“辛酸”、“愤怒”和“苦难”,但是当代中国人不会愧对祖先,“中华的希望像太阳一定会升起”,对于民族精神的呼唤荡气回肠,中华儿女的历史责任感油然而生。同类歌曲还包括如《黄河源头》(1988),“黄河的源头在哪里? 在昨日发黄的史书里”,“浑格嘟嘟的流呀流,流千年积怨,甜格润润的飞呀飞,飞千里万里;一朵浪花,是一个故事,洒向那个神州古老的土地”,“一朵浪花,是一个脚印,向太阳那个升起的地方走去”。词作者借歌唱黄河源头来展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悠久的文明史足以激发炎黄子孙对祖国由衷的热爱与自豪。

(二)以祖国为母题激发情感共鸣

文学艺术本身与国家观念有着天然的联系,祖国作为文艺创作的母题是永恒的。[2] 许多以祖国为抒情对象的优秀作品都饱含音乐家个体对于祖国的热爱,并由此唤醒听众群体心中的情感共鸣。《我和我的祖国》(1984)一歌的词作者在接到曲谱之后,一直在琢磨怎样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曲调所蕴含的情绪。后来在张家界采风时,看见窗外的天子山风光无限,瞬间,他想到了有着锦绣山河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从心底喷涌而出。[3] 真情实感才能使听众感同身受,完成对于共同身份的想象。而事实上这首充满了对祖国的深情厚爱的歌曲在李谷一首唱之后,也迅速得到群众的广泛欢迎,久唱不衰。

《祖国啊我永远热爱你》、《祖国慈祥的母亲》等许多作品都采用了把个人和祖国之间的关系比喻为子女与母亲的审美手法,重新阐释、认识、表述历史,激发一种政治的爱。关于亲族关系的词汇(如祖国母亲等)与关于故乡的词汇都是指那些与人们有自然联系的事物。“在所有‘自然的’事物中总是都存在着某些不容选择的东西。因此,民族的属性就被融入肤色、性别、出身、出生的时代等——所有那些我们无法选择——不得不这样的事物中。”[4]170 因此,对于共同体的想象就带有了一种古老而神圣的意味。无可选择、与生俱来的“宿命”使得“民族可以要求(成员的)牺牲”[4]170,而且这种牺牲被认为是无私、伟大且尊贵的。这就是一种爱国主义情怀。对民族共同体的爱唤醒了民族主义意识,使人们可以为国家献出生命,正如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那样。

二、凸显民族认同

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总体风貌一旦形成就不会发生大的变动,所以民族认同也是稳定存在的,但不同代际间总会有差异。新时期的民族认同所发生的变化,通过民族精神和民族象征凸显出来,使人民明辨并继续凝聚在一起。

(一)民族精神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彰显

卢梭认为“每个民族都拥有,并且必须拥有品质特征”[5]27,这是不同民族间彼此区别的重要表现。此处民族的品质特征可理解为民族精神。20 世纪 80 年代歌曲中表达的民族精神可概括为:忠诚、开拓、创新、执着、奋斗、奉献等。第二届“当代青年喜爱的歌”获奖歌曲《心愿》(1987)真实地反映了全国人民共同的心愿,也唱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当年我打起腰鼓诉说心愿/纯朴的人们翘首期盼/心灵在播种着富强的梦幻/翻身的土地争奇斗妍/虽然严冬太久/冷却了激动的笑颜/挺立的依然是泰山/永恒的依然是春天

几辈人前仆后继探索明天/坎坷的道路汗浸血染/巨龙将要起飞的时刻/沉重的翅膀诉说艰难/重整万里河山/这是我中华的心愿/燃烧的是热血/不朽的永远是信念

我们对着太阳说/向往不会改变/我们对着长江说/追求不会改变/我们对着大地说/贫穷总会改变/我们对着黄河说/生活总会改变。”

从歌词中我们感受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与命运抗争、执着追求富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乐观自信,而这些正是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的“民族魂”,鼓舞激励着人们为祖国奋斗。

这个时期,军旅题材的歌曲中含蓄流露的人文

关怀也与改革开放之前大不相同。敢于从正面表达战士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这种真实比“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②的直白更加感人。就在这种真情实感的流露中,凝聚出牺牲、奉献的民族精神,感染着每一个中国人。“当代青年喜爱的歌”一等奖作品《十五的月亮》曲作者之一的铁源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的心目中,祖国、党和战士的形象都是具体的,而不是一句空话。……党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同志和亲人中间,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力量的源泉在哪里?就在这里!为什么《高山下的花环》中,靳开来在战场上看妻子的照片?他也是人,他也有七情六欲,这也是力量的源泉……军人的歌必须有军人的真情……”[6]205 真挚的情感才能引发共鸣,这样的战士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但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毅然为国捐躯,舍小家为大家,这就形成了一种具有感染力和示范效应的牺牲和奉献精神。“也许我告别就不再回来……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也许我长眠再不能醒来”,但是“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无私的奉献精神跃然于纸面,回荡于耳际。

(二)民族象征的重新确认与强调

“民族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民族过去的有关叙事来形成的”[7],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而“音乐总是从自身的文化现实中获取题材”[8]70。即只有在生活中存在某种文化现实,它才能成为音乐表现的对象。但并非民族过去的全部都能成为音乐素材,用来构筑民族认同的、可作为民族象征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这是因为“文化对现实的题材进行了筛选”。[8]71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影响着词作者选择这些而非那些题材。同时,也正是中华民族共享的历史文化赋予了这些题材对中国人而言独特的意义。

泰山负载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精神重量,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长城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连接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甚至于外国人看到长城就会想到中国。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哺育了中华儿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母亲河。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中国境内的草原、戈壁等,也寄托着一些民族的深沉情感,故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根据中央电视台播放的 24 集纪录片《话说长江》片头曲填词、获“当代青年喜爱的歌”三等奖的《长江之歌》,通过描绘长江的气势磅礴和深沉永恒,使人真切地体会到长江是祖国母亲的血脉,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广袤地域深感自豪;《黄河源头》气势恢宏、粗犷,词作原为《黄河组歌》中的第一首,富有诗意和张力。词作者通过追寻黄河的源头,歌颂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以黄河万里归大海象征古老的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趋势。被誉为“歌坛天骄”的腾格尔创作的《蒙古人》(1985)等一系列深情咏叹草原的民族歌曲,唤醒了所有人灵魂深处对故土的挚爱。

抽象的民族认同由此被具体化为具象的民族象征,通过这种再次确认和重新强调,“为表达、代表和加强民族的定义范围服务,并且……把民族内部所有成员团结起来。”[5]9

正如《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象征,《歌唱祖国》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象征,《走进新时代》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象征一样,《我和我的祖国》、《长江之歌》、《我的中国心》、《我们是黄河泰山》等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群众耳熟能详、至今仍传唱不衰、堪称时代象征的优秀作品。

三、冀求民族理想

(一)对于国家完全统一的执着追求

民族、国家统一是民族国家形成的要件之一,而且中国政治哲学中历来推崇“大一统”。孟子在回答梁襄王关于天下怎样才能平定的提问时,就明确地回答“定于一”。③老子也曾说过:“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天下正。”④中国历史证明,只有实现统一才有长久安定。这种“大一统”思想自秦汉以降便成为中国政治的基本价值。虽然现代民族国家追求的统一不同于帝国时期的“大一统”,前者包含民主的因素,权力统一于中央政府,国家拥有固定的边界,而后者权力统一于封建君主,形成自中心向外的辐射,权力边界范围与王权大小成正比,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对于统一的冀求始终是中国人价值观的文化背景。

中国改革带来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国际地位的上升,引发对“祖国统一”日益高涨的渴望。许多表达这种情感的歌曲应运而生。获“当代青年喜爱的歌”鼓励奖的《鼓浪屿之波》,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感情真挚动人。以娓娓道来的方式抒发了鼓浪屿与基隆港相连,“唱不尽骨肉情长”,“舀不干海峡的思乡水”之情。结尾直抒胸臆,“渴望快快见到美丽的基隆港”,表达了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的心愿。反复两次的“我渴望”更是表达出感情的强烈。

同时,在探讨民族主义的时候,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或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与祖国大陆分

隔,或是离开故国赴海外谋求发展。但空间的遥远并未导致感情的生疏,他们对祖国依然保有深沉的爱。1987 年春节晚会上由美籍华裔费翔演唱的台湾著名音乐人制作的《故乡的云》,表达了海外游子对故土的思念,“归来吧,归来哟”宛如祖国母亲对赤子的声声呼唤。又如,香港歌手张明敏 1984 年春节晚会上演唱的具有很强艺术感染力的《我的中国心》,是最早通过官方渠道进入大陆的港台流行音乐作品之一。歌词中“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成为游子们想象祖国的情感符号,也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的文化象征。“洋装”包裹下的“中国心”,这种意义建构,让血浓于水的民族文化核质得以一种血脉传承。[9]“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这首歌让被“文革”深深禁锢的人们意识到,原来还有这样一群中国人,原来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原来大家对于祖国的那份感情没有什么不同!

(二)富强的中国向何处去——“天下主义”背景下的民族主义

在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中国需要民族主义充当强大的粘合剂和兴奋剂,提供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支持。但世界尤其是西方如何看待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呢?一个吊诡的事实是民族主义发源地之国家却日益对后发的民族国家感到不安、怀有敌意。我们可以从民族主义的逻辑来理解。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以及相伴随的经济复兴、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增加,会使已形成的民族国家感到不安,即使这种力量的增长不过是与其大国地位相适应。另外,世界历史证明,民族国家的崛起往往伴随大规模的向外扩张。故西方人据其经验得出中国威胁的论断。

但中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差异决定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狭隘的扩张的民族主义。儒家学说作为孕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土壤,[10]强调的和谐与“仁”决定了中国民族主义温和的特质。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天下主义”背景下的民族主义。它是防御的、“解放的”民族主义,是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入侵而激发出的“反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时至今日,在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世界中,中国的民族主义依然秉承有“天下”的精神,“天下主义”始终是中国精英分子挥之不去的价值关怀和道德取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国家、身为二战的战胜国对曾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免除了战争赔款等事实力证了这样的观点,即“中国的民族主义仍然包含着为争取民族平等和世界和平而容忍损害的让步精神”[11]。这种千年积淀的文化传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词作者。他们或有意或无意地表达对于和平、富强、安宁的向往,消解过激思想的戾气。

为纪念北京解放 40 周年专题文艺晚会而创作的《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唱出对祖国母亲的生日祝愿即“永远没有忧患永远宁静”,“月儿常圆儿女永远欢乐”,“逆风起飞风雨中获得收获”。获“当代青年喜爱的歌”一等奖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创作于“文革”结束后不久,新的农村经济政策使辽阔的田野生机蓬勃,包产到户的农民干劲十足,对新生活充满了期望。词作者不仅仅是在歌颂农村,“歌颂整个神州大地新的觉醒和新的腾飞”[6]189,同时也展示出中华民族对于明天的美好想象,歌词所描绘的宁静祥和的生活状态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希望所在,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未来都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第二届“当代青年喜爱的歌”获奖歌曲《我们是黄河泰山》的歌词:“我面对大海长天,用歌声向未来呼唤,中华的希望像太阳一定会升起,我们不负祖先,继往开来,走向明天”,表达出中华崛起是中华民族的夙愿,是炎黄子孙的历史重任。我们建设祖国、发展经济更多是因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而非在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称霸一方。

四、结语

随着中国大陆开放程度的加深,港台和西方流行音乐进入内地,给内地音乐工作者们带来新的灵感。歌曲内容上逐渐不再以领导人个人崇拜、文件方针宣讲、标语口号等为主,而是转向充分表现人民的优秀品质、呈现欣欣向荣的社会生活方面。但实际上优秀的作品就是对人民的教育,引导人民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支持。文艺的政治使命从一方面看是淡化了,从另一方面看又是深化了。[12]

中国当代著名音乐学学者曾遂今指出:“社会变革期的音乐生产是人类最辉煌、壮丽的音乐生产,这是因为,民族的沦陷、民族的血泪、民族的振奋、民族的团结、民族的解放,是调动社会群体高度觉醒和凝聚的有力杠杆,而艺术此刻才能集中地、有力地显示出其功能。”[13]的确,这一时期的歌曲清新悠扬,直抒胸臆,毫不做作,深受群众喜爱。在 1985 年 9 月由文化部、广播电视部、解放军总政、中国音协、团中央联合举办的“当代青年喜爱的歌”评选(评选范围是 1980 年以来的国内创作歌曲)中,入围的 150 首歌曲中仅歌名包含“祖国”、“中国”等类似字眼的

就有 21 首⑤,达到 14%。这些歌曲切实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之情,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培养了民族自信心。在这次活动中,河南淅川县九重乡周岗村的村民来信说:“我们这里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没有电视机、录音机,只能从收音机里听到我们喜爱的歌,从歌曲中得到美的享受,激发我们改变家乡面貌的信心。”黑龙江某农场劳改人员来信说:“节日的晚上……歌声抚慰着我们痛苦的心灵,歌声给我们重新生活的力量和希望,歌声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去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母亲……”[14]

“音乐是一种群众活动的精华……却同时也是权力合法性的必要根源力量之一:尝试去导正音乐是每一个权力系统必须冒的险。”[15] 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次成功的试验。当时的音乐工作者精心编写歌词,通过展现共同的经历使国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了更清晰的体认;通过重新解读历史激发出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重现民族尊严;通过彰显新时期民族精神,在潜移默化中教育人民;通过重新确认与强调民族象征,凝聚起一种稳定的关于“共同体”的情感;不仅表达了对于富强、统一的执着信念,也宣告了对于和平、安宁的不移向往。这些作品对于转型期中国民族主义的构建起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 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M]//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28.

[2] 阎国忠. 文艺与政治——一个应重新审视的话题[J]. 理论与创作,2002(5):10.

[3] 李凌,薛范. 名歌经典:中国作品卷Ⅰ[M].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6:25.

[4]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吴叡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 安东尼·史密斯. 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M]. 叶江,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6] 于林青. 中国优秀歌曲百首赏析[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

[7] 彼得·海斯·格里斯. 浅析中国民族主义:历史、人民和情感[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11):43.

[8] 刘承华. 文化对音乐的意义限定——“文化影响音乐的机制”研究之三[J]. 乐府新声,2007(1).

[9] 陆正兰. 歌词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02.

[10] 马庆钰.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发展逻辑[J]. 政治学研究,1998(2):62.

[11] 盛洪. 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J]. 战略与管理,1996(1):18.

[12] 阎国忠. 邓小平文艺政治学初论[J]. 理论与创作,1996(2):5.

[13] 曾遂今. 音乐社会学[M].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150.

[14] 选票中的心声[N]. 中国青年报:1985-12-29(3).

[15] 贾克·阿达利. 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M]. 宋素凤,翁柱堂,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5.

注释:

① 许多学者都探讨过“共同体”这一概念。例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齐格蒙特·鲍曼在其《共同体》一书中指出共同体是给人美妙感觉的温暖的家,人们在其中相互依赖,用一定程度的自由交换安全感。本文借用此概念意指民族国家。

② 引自陆原、岳仑词,岳仑曲《我是一个兵》(1950)中的歌词。

③ 见《孟子·梁惠王上》。

④ 见《老子·第三十九章》。

⑤ 根据《中国青年报》1985 年 9 月 6 日第二版《朋友,请投“当代青年喜爱的歌”一票》提供的歌曲名单统计。

[责任编辑:陈可阔]